

## 关于《成吉思汗碑铭》的研究

敖 力 布

—

《成吉思汗碑铭》者，乃是指刻有五行古体蒙古文、约有一度左右长的一方人工花岗岩石碑而言。由于该碑文第一行首刻“成吉思汗”一语，研究铭文的学者们便将该碑名之为《成吉思汗碑铭》（《成吉思汗石文》 $\text{ᠠᠮᠴᠢᠭᠢᠰᠢᠬᠠᠨ ᠶᠢᠨ ᠶ᠋ᠢᠨ ᠶ᠋ᠢᠨ ᠶ᠋ᠢᠨ}$ ）。也有称为《成吉思汗石碑》（ $\text{ᠠᠮᠴᠢᠭᠢᠰᠢᠬᠠᠨ ᠶᠢᠨ ᠶ᠋ᠢᠨ ᠶ᠋ᠢᠨ ᠶ᠋ᠢᠨ ᠶ᠋ᠢᠨ}$ ）；《也孙格·蔑儿干的光明碑》（ $\text{ᠶ᠋ᠢᠨ ᠶ᠋ᠢᠨ ᠶ᠋ᠢᠨ ᠶ᠋ᠢᠨ ᠶ᠋ᠢᠨ ᠶ᠋ᠢᠨ}$ ）等等的。

据载有蒙古汗国时期朝政要事的历史文献所知，成吉思汗曾派遣以兀忽纳为首的百名使臣前往中亚的撒儿塔兀勒（即花刺子模——译者）国土，全被捕杀了。因此，1219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，征伐中亚撒儿塔兀勒。对此《蒙古秘史》曾记载说：

“后来，成吉思合罕因为派往撒儿塔兀勒的兀忽纳等一百名使臣被截杀了，就说：‘撒儿塔兀勒部切断了我们的黄金绳索，还能饶他吗？给兀忽纳等一百名使臣报仇雪恨，去征伐撒儿塔兀勒部（在中亚突厥斯坦）。’”<sup>①</sup>

《蒙古秘史》又记：

“免儿年（1219年），成吉思合罕携带忽阑合敦，以少弟斡惕赤斤那颜留守大营，越过阿剌岭，出征撒儿塔兀勒。”<sup>②</sup>

《圣武亲征录》上说：

“己卯，上总兵征西域。庚辰，上至也儿的失河住夏。秋进兵，所遇城皆克；至斡脱罗儿城，上留二太子，三太子攻守，寻克之。”<sup>③</sup>

《多桑蒙古史》也记载说：“1219年（616）秋，成吉思汗自也儿的石河畔进兵往击大食国（Tadjiks）。”<sup>④</sup>

那以后，征伐持续七年，终将撒儿塔兀勒平服。1225年，在成吉思汗带领大军踏上返回蒙古故地的归途中，来到了阿尔泰和上额尔齐斯河附近的不哈·速赤忽（ $\text{ᠨᠠᠬᠠ ᠰᠤᠴᠢᠬᠤ}$ ）地方，扎下营盘。这时，自蒙古故乡前往迎接的那颜们和百姓也到达这里。于是就在这里举行了全蒙古的大会盟及规模盛大的宴会，以庆祝成吉思汗的大捷。在这次宴会上，举行了射箭比武，奖赏了有功的那颜和骁勇的射手。同时，合撒儿的第二子也孙格（成吉思汗的

侄儿)瞄准三百三十五度远的地方射了一箭,并超越了所有的勇士和射手。为了表彰这位百发百中的优秀射手的这次不寻常事件,便在这面永恒的纪念碑上作了记载。从此,也孙格·弘古都儿的名子,也就以也孙格·蔑儿干之称而闻名于各国封地。之后,1225年秋,成吉思汗回到土兀勒河畔<sup>⑤</sup>,下榻于宫帐之下。

关于这件事,《蒙古秘史》曾记述如下:

“成吉思合罕征伐撒儿塔兀勒七年……成吉思合罕从那里回兵归途中,在额儿的失河上过夏。鸡儿年(1225年)的秋天,回到土兀刺河的黑林地方,搭立起大宫帐住下了。”<sup>⑥</sup>《圣武亲征录》中说:

“甲申旋师,……避暑,且止且行。乙酉春,上归国。自出师,凡七年。”<sup>⑦</sup>

《多桑蒙古史》的记载如下:

“1224年夏冬二季,成吉思汗全在道中。其二孙忽必烈旭烈兀,即后来君临东西两国之名主也,自叶密立河附近,及乃蛮畏吾儿旧日分界之地来见。忽必烈时年十一,射获一兔,旭烈兀九岁,获一鹿。蒙古俗儿童初猎者,应以肉与脂拭中指,兹成吉思汗亲为二孙拭之。复行至不哈速赤忽之地,设宴犒尝其军。1225年2月还其鞞耳朵。”<sup>⑧</sup>

从公元1225年之后,已经过去了五百九十三年漫长的岁月。1818年,俄国学者斯帕斯基(Г·СПАССКИЙ)首次报导了《成吉思汗碑铭》。他在报导中说:

“乌鲁伦古河从东流入额尔古纳河,其北,是长满树木的花岗石群山;而南,则是一片宽广的开阔原野。从山峦里淌出许多小河,可是它们都在汇入大海之前,就已潜入石隙之下。在这些众多的河流中有两条小河——克尔克尔(КырКыр)和孔堆(КОНДУЙ)河上,发现有几座建筑物的遗迹……在这些古迹的上游五公里之处,有几座古墓。这里值得注意的是,据一些人断言,以前在这些古墓近旁,曾有过花岗岩石的碑碣,上面用东方文字很好地刻着铭文;但据大多数人说,这块石碑是在孔堆河上的那些古代废墟中发掘出来的石碑之一……这面碑后被运往涅尔琴斯克(即尼布楚——译者)工厂去了,与其它几件文物一起被保存在那里。”<sup>⑨</sup>1839年,又被运送到圣彼得堡。

成吉思汗碑铭高:202厘米、宽:740厘米、厚:22厘米,上刻21个古体蒙文词。原碑从右角至左角已出现裂痕,至使几处字母已模糊不清。(见图版)

此碑现存苏联列宁格勒的爱尔米达什(Эрмитаж)博物馆内。

## 二

《成吉思汗碑铭》是反映蒙古族历史、文化、文字、风俗等方面历史性特征的最为珍贵的文物,堪称蒙古族历史实物中最早的实录。自从它被发现以来,引起了各国学者的研究兴趣。兹简述如下:

(一)石碑被发现的当初,西伯利亚的翻译官们和一些喇嘛,就曾试图解读过,他们很容易地读出了几个并不费解的词。同时,恰克图的蒙文教师旺其科夫先生也曾进行过译读。尔后,被称为俄国蒙古学家的施米特,力图解读出这些碑文,但他却未能恰如其分地解读出



当成吉思汗夺取了撒儿塔兀勒政权回来后，蒙古人的那颜们和百姓集会举行比赛，也格孙瞄准三百三十五度远的地方射了一箭。为纪念此举而立碑。〔按：克留金先生的原作未能获得，这里引用的是间接的材料，因而难免有不确之处，提请注意。〕

（四）甲：1950年，斯·穆拉雅玛（С·МУРАЯМА）发表了关于这一碑铭较短的研究论文。作者介绍了施米特、班扎罗夫、克留金等对这一碑文的研究之后，将班扎罗夫对碑文前三行的读法与克留金对碑文第四行、第五行的读法合拼起来；并对其中个别释读作出注释。

乙：鲁曼彩玛（Г·РУМАНИЁВА）也曾发表过关于对此碑研究的一篇论文。作者罗列了施米特、班扎罗夫、穆拉雅玛关于碑文的研究。然后将克留金的解读及其注释与前者合拼于一起，并对若干词语作了注释。

（五）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学者策·达木丁苏荣教授（Ц·ДАМДИНСУРЭН）在其《蒙古文学史》一著作的《成吉思汗碑铭》一节中，简要地提到了施米特、克留金、班扎罗夫等的研究情况；也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。

他对该碑铭的解读如下：

ᠮᠤᠩᠭᠤᠯᠤᠯᠤᠰ ᠶ᠋ᠢᠨ ᠶ᠋ᠢᠨᠠᠭᠤᠨ  
ᠶ᠋ᠢᠨᠠᠭᠤᠨ ᠶ᠋ᠢᠨᠠᠭᠤᠨ ᠶ᠋ᠢᠨᠠᠭᠤᠨ ᠶ᠋ᠢᠨᠠᠭᠤᠨ ᠶ᠋ᠢᠨᠠᠭᠤᠨ

可标音为：

- 1、qinggis hagan
- 2、Sartagul irgen dagulaju baguju hamug monggol ulus—un
- 3、irgen buha soqihai hurigsan—dur
- 4、Yisunggei honghodur—un gurban jagud guqin taban aldas
- 5、tur ondotaluga

〔汉译〕：

成吉思汗

征服了撒儿塔兀勒的百姓，

蒙古国百姓

在布哈·苏赤海地方欢宴；

也孙格·洪古图尔射箭

三百三十五度远。

策·达木丁苏荣教授，对于这块碑建立的缘由没有直接作出解释，但在该书的五十一页中有这样的话：“把ᠶ᠋ᠢᠨᠠᠭᠤᠨ ᠶ᠋ᠢᠨᠠᠭᠤᠨ ᠶ᠋ᠢᠨᠠᠭᠤᠨ 写成ᠶ᠋ᠢᠨᠠᠭᠤᠨ ᠶ᠋ᠢᠨᠠᠭᠤᠨ ᠶ᠋ᠢᠨᠠᠭᠤᠨ，这在古籍中是有根据的。”由此看来，显然他是间接地表达了同意克留金的观点。并说明“这块成吉思汗碑文大约写于1224年”。⑫

（六）1956年，蒙古人民共和国学者乌·纳木楠道尔基发表了《蒙哥汗光明碑和行

宫的发现与研究》的论文。在论文的开首部分，他将此碑名之为《也孙格·蔑儿干的光明碑》，并叙述了自己对这一碑铭的观点。在他简要地追述了自碑铭发现以来及起初的研究状况后，写道：

“蒙古汗国于1219年至1225年连续六、七年对撒儿塔兀勒进行了征伐，并在1224（1225）年从撒儿塔兀勒返回，到达可能属于阿尔泰附近之额尔齐斯河源的布哈·苏赤海地方聚会，举行了欢宴。弘古都儿（或者温古都儿）宗族的也孙格·蔑儿干向三百三十五度远之处射中一箭。为永远纪念这一空前绝后的壮举，特立此碑。根据《元史》卷二中的记载来看，那时，因凯旋归来而举行校射，其史实是毋庸置疑的。班扎罗夫等学者在十九世纪时判断此碑大约立于1225年——1226年之际。⑬接着，他又写道：

“《也孙格·蔑儿干光明碑》之碑文，按原样可照录如次：

ᠶᠠᠨᠠᠭᠤᠨ ᠰᠢᠨᠭᠢ  
 ᠠᠭᠤᠯᠠᠭᠤᠯᠠ ᠶᠢᠷᠭᠢᠨ ᠳᠠᠯᠢᠵᠤ ᠪᠠᠭᠤᠵᠤ ᠬᠠᠮᠤᠭ ᠮᠣᠩᠭᠣᠯᠤ ᠤᠯᠤᠰ ᠤᠨ  
 ᠠᠷᠠᠳ ᠠᠶᠢ ᠪᠤᠭᠠ ᠰᠣᠵᠢᠭᠠᠢ ᠬᠤᠷᠠᠭᠰᠠᠨ ᠲᠤᠷ  
 ᠶᠢᠰᠤᠩᠭᠡᠢ ᠬᠣᠩᠭᠣᠳᠤᠷ ᠤᠨ ᠭᠤᠷᠪᠠᠨ ᠵᠠᠭᠤᠨ ᠭᠤᠴᠢᠨ ᠲᠠᠪᠤᠨ ᠠᠳᠠᠰ  
 ᠶᠤᠨ ᠲᠤᠷ ᠣᠨᠲᠤᠳᠤᠯᠭᠠ ” ⑭

可标音如下：

- 1、qinggis han—i
- 2、sartagul irgen dauliju baguju hamug monggol ulus—un
- 3、arad—i buga soqigai huragsan—tur
- 4、yisunggei honggodur—un gurban jagun guqin tabun aldas
- 5、tur ontudulga

（七）1980年，内蒙古《蒙古语文》杂志第三期《文物》专栏上，发表了赛熙亚乐同志关于《成吉思汗碑铭》的报导。从报导中得知，内蒙古语言研究所撰写的《蒙古文字简史》（初稿）中，关于这一碑铭发现地址，有如下记述：

“此碑发现于贝加尔湖东侧尼布楚区乌鲁伦古河附近之皇帝遗址中。”

其释读如下：

ᠶᠠᠨᠠᠭᠤᠨ ᠰᠢᠨᠭᠢ  
 ᠠᠭᠤᠯᠠᠭᠤᠯᠠ ᠶᠢᠷᠭᠢᠨ ᠳᠠᠯᠢᠵᠤ ᠪᠠᠭᠤᠵᠤ ᠬᠠᠮᠤᠭ ᠮᠣᠩᠭᠣᠯᠤ ᠤᠯᠤᠰ ᠤᠨ  
 ᠠᠷᠠᠳ ᠠᠶᠢ ᠪᠤᠭᠠ ᠰᠣᠵᠢᠭᠠᠢ ᠬᠤᠷᠠᠭᠰᠠᠨ ᠲᠤᠷ  
 ᠶᠢᠰᠤᠩᠭᠡᠢ ᠬᠣᠩᠭᠣᠳᠤᠷ ᠤᠨ ᠭᠤᠷᠪᠠᠨ ᠵᠠᠭᠤᠨ ᠭᠤᠴᠢᠨ ᠲᠠᠪᠤᠨ ᠠᠳᠠᠰ  
 ᠶᠤᠨ ᠲᠤᠷ ᠣᠨᠲᠤᠳᠤᠯᠭᠠ ”

可标音为：

- 1、qinggis hagan
- 2、Sartagul irgen daguliju baguju hamug monggolul lus—un
- 3、ihrigen tagan qitgji buga sojigai hurigentur
- 4、Yisungi hontudur—un gurban jagud guqin tabun aldas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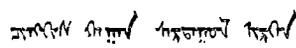




- 1、qinggis hagan
- 2、Sartagul iugen dauliju baguju hamug monggol ulus—un
- 3、Noyad—i buga soqigai huragsan tur
- 4、Jisunggei honggodur—un gurban jagud guqin taban aldas
- 5、Tur ondotalaga

## 2. 关于《成吉思汗碑铭》立碑的缘起问题

如上所述，我认为研究《碑铭》的学者们是把碑铭的意义本末倒置了。那么，它的主要意义何在呢？

我们看到的碑文首句，字迹清晰可辨，这就是：《》（成吉思汗征服了撒儿塔兀勒百姓）。众所周知，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，最终于1206年建立了统一蒙古汗国。1211年，成吉思汗出征金国、西夏，并和解停战。此后，便率众征讨中亚撒儿塔兀勒花剌子模这一场征服撒儿塔兀勒的战争，本乃成吉思汗出征中亚的首战。而且是旗开得胜。同时，这也是此后向亚、欧两洲进行旷日持久的大战的首捷。因而，为此大事祝捷，以宣扬蒙古汗国之威，就成了毋庸置疑之事。故此，于不合速赤忽地方，举行盛大会盟和欢宴之时，立下纪念碑石。在碑石上，将成吉思汗平服撒儿塔兀勒的大捷，首先铭刻于碑上，曰“成吉思汗征服了撒儿塔兀勒百姓”。总而言之，石碑铭文中开宗明义第一句，就反映出了蒙古汗国的强大威力已达到亚、欧两洲的各国及部落，亦即通向欧、亚的门户已被打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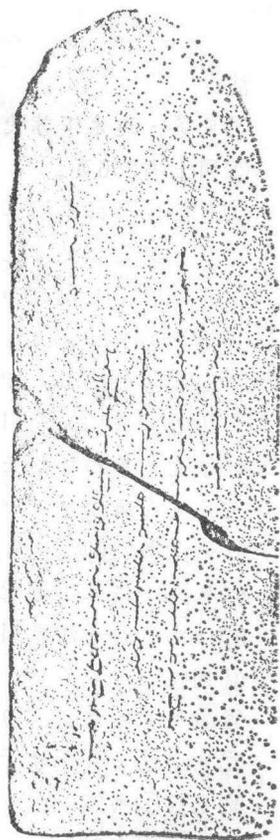
至于《成吉思汗碑铭》居于第二位的意义，当在于碑文之第三句“也孙格·洪古图尔射箭三百三十五度远之处”。如是，那又因何故对也孙格·洪古图尔的射箭中地，也要增加称赞一番呢？

首先，它要说明，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中，年青力壮的勇士在茁壮成长。而这，则反映了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汗国的政权。只有黄金家族的出身者才可继承；也唯其此，才完全具备了继承的力量和才能。《蒙古秘史》记载说：

“……同时我（成吉思汗——译者）也使一子承继汗位！对于我的圣旨，不要更改，不要间断，不要貽误，不要失错，凛遵奉行！斡歌歹的后代，如果虽然包着草，但是牛也不吃；虽然包着油，但是狗也不吃，象这样的东西，难道我的后代子孙中连一个好的也不会有吗？”<sup>⑧</sup>

其次，之所以要特别突出地宣扬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汗国中，年轻力壮的勇士们人材济济，茁壮成长，还在于它反映出了蒙古汗国在亚、欧两洲各国各部的势力，日趋强大。换言之，在于向亚欧两大洲的各国各部显示蒙古汗国强大无比的威力。

《成吉思汗碑铭》的第二句“全蒙古的那颜们在不合·苏赤海地方欢宴”一语，乃是指成吉思汗亲率大军，平服撒儿塔兀勒



凯旋而归时，全蒙古国的那颜们前往不合·苏亦海迎接，然后举行会盟与宴会，以示欢庆这件事而言。同时，成吉思汗向全蒙古的那颜们宣布了此后在征伐亚、欧两大洲所进行的持久战中，要忠贞不二，竭尽全力来贡献一切的信心和勇气。事实上，此后频乃的战事活动，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。

《蒙古秘史》对此有具体记载：

“……（成吉思汗）命令斡帖格歹族人捌儿马罕去征伐巴黑塔惕国的合里伯莎勒坛。

又在欣都思（印度）和巴黑塔惕之间有阿鲁、马鲁、马答撒里等国的阿卜秃城，命令朵儿边族人朵儿伯多黑申去征伐。

又令速别额台把阿秃儿去征伐北方的康里、钦察、巴只吉惕、斡鲁速惕、马扎刺惕、阿速惕、撒速惕、薛儿客速惕、客失米儿、孛刺儿、刺刺勒等十一部国，度亦扎勒河、扎牙黑河，直抵乞瓦绵，客儿绵城等地。”<sup>⑩</sup>

正因为《成吉思汗碑铭》的建立，具有这三方面的起因，故将其主要缘由铭刻于碑文之首的最先位置，而将居次的原因刻于其后，第三种意图则如一般行文惯例铭刻。这种情况，则是当时蒙古人的通常规则。

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五日

苏苏民 翻译

注：

①见策·达木丁苏荣编译《蒙古秘史》，谢再善汉译，中华书局，1956，247页

②同上书256页、

③《圣武亲征录校本》206—207页（手抄影印本）

④《多桑蒙古史》上册97页，中东书局，1962年。

⑤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士拉河。

⑥见注①书260页。

⑦见注③书219—220页。

⑧见注④书130—131页。

⑨原文见《西伯利亚通报》1818年第四集116—126页。

⑩详见《道尔基·班扎罗夫文集（俄文版）1955年，

⑪同上书220页。

⑫见策·达木丁苏荣《蒙古文学史》第一卷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，1957年，第50—52页。

⑬详见《蒙哥汗光明碑与行宫的发现和研究》1956年，乌兰巴托，第4页。

⑭同上书

⑮⑯见《蒙古语言》（蒙文版）1980年第3期，第5页。

⑰见《蒙古族文学资料汇编》第一集，149页，内蒙古语文研究所。

⑱见注①书256页。

⑲注页①书259页。